

反对波克罗夫斯基 历史观点

安·潘克拉托娃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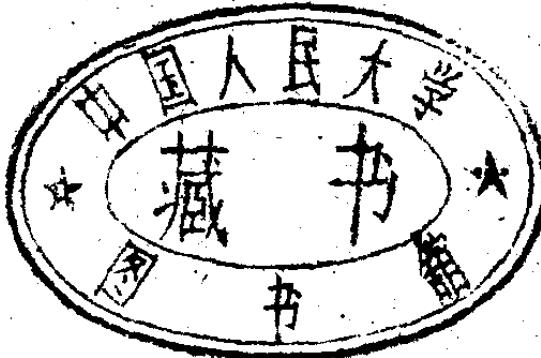
陈启能、李显荣译

B(3)/26
630782

反对波克罗夫斯基 历史观点

安·潘克拉托娃等著
陈启能、李显荣譯

RD05111



反对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点

(苏)安·潘克拉托娃等著

陈启能、李显荣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厘米 $\frac{1}{32}$ · 印张 5 $\frac{1}{4}$ · 字数 108,000

1962 年 9 月第 1 版

196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02·332 定价(七) 0.60 元

目 次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点的发展	
.....	安·潘克拉托娃 (1)
所謂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反馬克思主的 歪曲和庸俗化現象	叶·雅罗斯拉夫斯基 (102)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在历史教學問題 上的錯誤	安·維·福赫特 (132)
附录：波克罗夫斯基(苏联大百科全书)	(163)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历史观点的发展

安·潘克拉托娃

在党和政府 1936 年 1 月 26 日的決議中，提出了揭露和克服所謂“波克罗夫斯基历史学派”反馬克思主、反列寧主義、实质上是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的迫切政治任务。

苏联人民委員會和联共(布)中央的決議指出：“……克服这些有害的观点，是編写历史教科书，同时也是发展馬克思列寧主义历史科学和提高苏联的历史教育的先决条件，而这对于我們国家和我們党的事业以及对于教育正在成长着的后代，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① 党和政府严厉批評了提交审核的苏联史教科书，并决定組織懸賞編写新型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教科书。

以后的許多事件表明，这个決議是布尔什維克的警惕性和政治远見的何等高超的范例。

①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90—291 頁。

所謂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并非偶然地成了被內务人民委員部各机构所揭露的人民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僕僕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暗害分子、間諜和恐怖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基地。他們在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有害的、反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的帮助下巧妙地伪装了起来。

只有历史战綫上的工作者們的不可原諒的、糊塗的粗心大意和丧失警惕性才能解釋这个事实——即这群列宁主义的敌人的狂妄党徒长久地和逍遙法外地在历史領域里做着坏事。

列寧在对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概要》一书的意見中，在表示贊同編寫馬克思主義的苏联史教科书的創举以后，早就用客气的、但坚决的方式強調指出，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科书應該是具体的，應該有事实。列寧建議波克罗夫斯基用即使是年表索引形式的事实材料来补充自己的教科书。列寧写道：“学生要想不是肤淺地了解，要想知道事实，要想学会对比新旧科学，必須既熟悉您的书，也熟习书中的索引。”^① 在这个指示中，列寧要求波克罗夫斯基改变那些引导他去創作往往是独創的、但非馬克思主義的历史著作的历史观点。

但无论是否是波克罗夫斯基本人，也无论是他的“学派”，都沒有执行列寧的指示。他們繼續在历史科学和历史教学中傳播社会学的抽象公式，以代替具体的、馬克思主義的历史。波克罗夫斯基和他的“門徒們”用社会学代替具体历史，用抽象公式代替事实，实质上是企图取消历史这門科学。

① 《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5頁。

这里还应补充說一說人民的敌人在历史科学領域內有意識的破坏“活动”。出版了一系列“历史”书籍，在那里面用“科学”研究作为幌子贩卖着右倾—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思想貨色。各种历史杂志都被假历史学家的間諜—暗害分子匪帮中的恶徒們利用作他們的讲坛。他們利用了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对历史这門科学的取消主义观点，并展开了实际的破坏活动，使学校中的历史教学化为烏有。学校中的历史課被带有政治常識成分的、公式化的社会学替代了。无论在小学、无论在中学、无论在高等学校中都沒有教科书。在学校中被用作基本教材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概要^①，并不适合作教科书。經常变换的、矛盾百出的历史教学大綱使学生們茫无所从。干部的培养几乎停止了。历史系都被“改組”和取消了。教育人民委員部各机构（有不少敌对分子也钻到这里面去了）不仅不糾正，反而經常鼓励这种有害的实际活动。历史科学的某些科学中心（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协会，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历史研究所），以及学校（这些地方的領導都由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坏蛋們和反革命兩面派操纵了），更从“理論上”来“論证”这种有害的实践。1930年3月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协会和历史科学研究所作出決議：消灭“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課題的因循守旧”（按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說法），并取消把历史（从而也是研究和讲授历史的）分为古代史、中世紀史和近代史的分法等等。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研究被对社会形态和对問題的研究所代替了；但是社会形态

① 指《俄国历史概要》。——譯者

的研究并不是具体地、历史地，像马克思和列宁所做的那样，而是把它們当作抽象的公式。历史变成了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敵对的、空洞的、公式化的、无結果的社会学。

波克罗夫斯基的反馬克思主义、反列寧主义的观点和概念特別被社会主义的敌人所利用，作为他們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偷运自己的資产阶级思想和反革命“理論”的工具。在各种历史會議上，在教研室里，在課堂討論时，“波克罗夫斯基学派”中的假历史学家們經常在理論性的和历史性的“爭論”的幌子下直接偷运托洛茨基的私貨，并对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础进行公然的修正。

还在 1929 年 12 月 27 日，斯大林同志就在馬克思主义土地問題专家代表會議上号召在思想战線上要特別警惕，号召和資产阶级理論的傳布展开斗争，同时并要求对理論問題进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研究。

1931 年斯大林同志对理論領域內、特別是历史領域內的工作人員提出了新的警告。在給《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編輯部的《論布尔什維主义历史中的几个問題》一信中，斯大林同志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历史战線上偷运托洛茨基私貨的事实。但尽管有斯大林同志的直接指示和警告，历史学家們仍不善于作出一切必要的結論，也不善于从这些事实中吸取教訓。

与此同时，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党不止一次地要求与历史研究及教学中的取消主义倾向坚决斗争。中央委員会和人民委員会在許多实际措施和有关学校問題的具体決議中經常提醒注意，必須改善学校中的历史教學情况。

1932 年 8 月中央委員会指出，“以历史的方法对待社会

科学各科教学大纲还不够。”联共(布)中央委托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制标准的历史教科书。1934年5月这些教科书被审查了，并被认为是不合要求的。当时就建立了专门的历史学家工作组，它们的任务是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1934年5月16日的决议中，指出了在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中，以及在科学机关的历史研究方面所存在的基本缺点。

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认为：

“在本国史的教学中，不是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和依照年代次序叙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向学生讲授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

在中央委员会1934年5月16日决议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改善苏联的历史教育情况的坚决措施，其中包括历史系的恢复。但历史战线的改组工作仍然进行得很慢。虽然有党的指示和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诺夫同志的亲自帮助，但编写好的纲要和以后的教科书，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1936年1月26日的决议中，不仅再次指出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异常不良状况，而且还揭露了这种不良状况的原因和根源。它们首先强调指出了“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在坚持自己的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害的历史观点中的顽强和反抗。

1936年1月26日的决议指出：“上述教科书的编著者继续坚持那种已经不止一次被党所揭穿了的、并且显然是不可靠的历史判断和论点——其实就是尽人皆知的波克罗夫斯基

的錯誤。人民委員會和中央不能不認為，這證明在我們的某些歷史學家中，特別是研究蘇聯歷史的歷史學家中，還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而在實際上是對歷史科學的取消主義和反科學的觀點。”^①

黨和政府號召和這種觀點作堅決鬥爭，並強調指出了它們的性質和起源：“……這些取消歷史即取消科學的有害傾向和企圖，首先是跟我們的某些歷史學家中間所流行的錯誤的歷史觀點即所謂‘波克羅夫斯基歷史學派’的觀點相聯繫着的。”^②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的敵人在波克羅夫斯基的反列寧主義觀點的掩蓋下，對歷史戰線進行瓦解的時候，大力宣揚他的觀點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同時反對在歷史學家隊伍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任何微小企圖。在波克羅夫斯基的觀點遭到批評的情況下，這種批評也是從反列寧主義的立場出發的。

實際上這些歷史學家是聽命於敵人的，他們在政治上盲目无知，並且違背黨的直接和明白的指示和警告，拖延了改組工作，他們實質上同樣是反抗對波克羅夫斯基的歷史觀點和概念展開及時批評的。甚至直到最近，在歷史學家隊伍中的這個揭露性的和自我批評的工作還開展得十分不夠，而消除危害活動的後果的工作則進行得異常緩慢。根除歷史領域里的資產階級思想殘余的任務仍未徹底完成。人民的敵人利用波克羅夫斯基反列寧主義的有害觀點，阻礙了蘇聯歷史科學

①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歷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0頁。

② 同上。

的創造性发展。

历史战綫上的这种情况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党中央委員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以无数的指示和決議給了苏联历史学家們极大的帮助。現在，我們光荣的內务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們，已粉碎了历史战綫上和我国建設的其它战綫上的敌对的反革命巢穴。空气清新了。在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为历史科学空前未有的高漲創立了未曾有过的条件。在党的領導者們的帮助下，正在編写着供千千万万我們苏联的中学生用的、馬克思主義的苏联史教科书。其它历史教科书的編寫工作也正进行着。在斯大林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关于国内战争历史的巨大工作正在繼續。中学和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已經极大地改善了。历史科学获得了在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广闊前景。

1938年5月17日在克里姆林宮高等学校工作人員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同志为先进的苏維埃科学的繁荣而举杯祝賀。他說：“这是这样一种科学：它的工作人員們了解科学中既成傳統的力量和意义，并且善于为了科学的利益而利用这些傳統，但終究并不希望成为它們的奴隶；这种科学有勇气和决心去粉碎旧傳統、旧常規、旧定則，当它們已經陈旧，当它們已經变成运动前进的障碍的时候；这种科学并且善于建立新傳統、新常規、新定則。”斯大林同志举出了最偉大的科学泰斗弗·伊·列寧的例子。列寧根据对俄国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作出結論說：唯一的出路就是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无产阶级的偉大領袖和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

林，依据世界历史的經驗，制訂了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他們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的唯物主义的研究，使他們能够极其英明地在政治上领导革命群众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深刻地研究了一切时代和民族的群众运动，对个别历史人物也很注意。在研究既往历史經驗的时候，他們善于洞察当今錯綜复杂的阶级状况，用天才的远見指出前景，并为偉大的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

历史科学以前一直是、而现在仍然是无产阶级爭取共产主义斗争的强大武器。苏联的青年一代是爭取共产主义的新战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設者的新队伍。他們必須具有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知識和深刻了解，他們将为改造人类社会而生活和工作。他們應該知道和了解劳动人民被奴役和解放的历史，應該知道一般地在人类历史各阶段，特別在我們偉大祖国的不同时期，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者斗争的情况和目的。只有那时，在和过去对照之下，我們光輝的、在偉大的历史激战中爭夺得来的現在，才会显得更雄偉、更可貴和更有价值。只有那时，我們爭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才会变得更深刻、更自觉和更坚决。

妨害认识我們光荣历史的反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必須彻底粉碎。在历史学家間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維克式的批評与自我批評的基础上，苏联先进的苏維埃历史科学必將获得空前未有的創造性高漲。

二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異常明确地制定

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基本任务，以便加强共产党员在反对列宁主义敌人的斗争中的理论武装：

- “1. 把党的理论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
- 2. 在党的一切环节中加强思想工作；
- 3. 在党的队伍中不倦地宣传列宁主义；
- 4. 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党组织及其周围的非党积极分子；
- 5. 不要掩饰而要大胆地批评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
- 6. 不断地揭露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和思想残余。”^①

党的领袖的这些指示是和历史战线上共产党员的任务直接有关的。

在这些指示的基础上，应该勇敢地展开对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反列宁主义观点的批评，并具体地揭露他的历史著作中的敌对观点。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是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为历史学家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批判了贵族资产阶级史学，但他自己并没有克服他在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前所持有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由于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在他身上甚至还有所发展，以致使他离开了布尔什维主义，就像在反动年代（1908—1911年）

^①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1页。（着重点是安·潘克拉托娃加的）

或者在簽訂布勒斯特和約时期(1918年初)所曾发生过的那样。

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其中包括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对历史科学和俄国历史具体发展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波克罗夫斯基在他生活各个时期的政治立场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的，他之参加各种和布尔什维主义相敌对的政治派别，不能不最坏地影响他的历史观点的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在分析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形成为历史学家的过程时，要紧密地和他的政治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考察的原因。

1890—1900年是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形成的第一时期。1891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学系毕业，以后就留在大学的俄国历史教研室做科学工作。同时他开始在女子师范讲习班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作为当时最有名的资产阶级教授——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和巴·加·维纳格拉德夫的学生，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从他们那儿培养了对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并学会了良好的科学工作技能。90年代初，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唯心主义世界观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理想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

1893—1894年间在莫斯科同时存在着许多自学和自修小组。经常举办和开设各种讲习班和公众讲演，出版活动和校外教育活动也很活跃。在历史方面，巴·加·维纳格拉德夫教授主编的《中世纪史读物》在90年代后半开始出版。年青的历史学家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也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所有这一切脱离政治的文化活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政

治发展，是完全和 90 年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亦步亦趋的。

1893—1894 年间莫斯科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增长了，这特别与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的反对民粹派的斗争有关。当时已经存在着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的学术讲演（例如 1891 年已死的格里哥里·门捷里施丹在莫斯科大学生小组上所做的报告）向青年们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点和经济观点。马克思主义者所展开的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普及。民粹主义的追随者——米海洛夫斯基、卡略也夫、瓦·沃龙佐夫、尼·一逊（尼·弗·丹尼尔逊）等人，在《俄国财富》和其它报刊上，在大学生小组里，在知识分子的小型晚会上，发动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战争，责怪他们“保护和提倡资本主义。”

弗·伊·列宁发起了反对民粹派的无情斗争。1894 年 1 月列宁到了莫斯科，并对著名民粹派分子沃龙佐夫（瓦·沃·）的报告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列宁反对沃龙佐夫的发言给所有的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对莫斯科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派的斗争帮助很大。90 年代列宁反对民粹派的斗争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彻底破产。在这个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列宁的卓越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这本书的胶印版在 1894 年就问世了，也就是在普列汉诺夫和司徒卢威反对民粹主义的作品发表前几个月。列宁领导了反对民粹主义的思想斗争，并以这个斗争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和传播。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在这时期是远远地站在革命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派的这些理論斗争之外的。他不知道列宁在这时期內所写的作品，并且和剛在莫斯科成长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毫无联系。90年代末和20世紀初，所謂的“合法馬克思主義”在許多知識分子代表中間影响很大。列宁当时立即就揭穿了这种思想的资产阶级性质。

在这个时候欧洲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到新的——帝国主义——阶段。俄国被拖进了世界市場，资本主义在俄国很快地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胜利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必然会在思想領域內有所反映。在粉碎了民粹主义的追随者們以后，在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中間，把馬克思主义当时髦的風气盛行起来了。

列宁在描述合法馬克思主义在90年代的“蜜月时期”时，这样写道：“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現象，这种現象发生的可能，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是誰也料想不到的。在一个完全沒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国家里，在凶恶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任何一点政治不满情緒和反抗表示都肆意摧殘的时代，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忽然打开了一条出現于受檢查的刊物上的道路，而用來說明这个理論的語言虽然是伊索寓言式的，但終究是一切‘感觉兴趣者’都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慣于把民意派（革命的民意派）的理論当做危險的理論，却照例沒有发觉这一理論的内部演变过程，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論的批評。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檢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军队終于发觉了新的敌人而加以攻击的时候，已經过去了不少的（照我們俄国的尺度來計算）时间了。在这个时

期，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一本又一本地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的雜志和報紙相繼創辦起來了，大家都紛紛變成了馬克思主义者，人們都來奉承馬克思主义者，向馬克思主义者獻殷勤，出版家因為馬克思主義書籍的暢銷而興高采烈。”^①

資產階級“同路人”企圖利用這個較大的社會運動，用隱蔽的自由主義的政治觀點來代替馬克思主義。這就是開始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司徒盧威、布尔加柯夫、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等人为首的“合法馬克思主义者”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代理人，他們力圖使馬克思主義去為資本主義辯護，去保卫資產階級利益。列寧把他們稱做“資產階級影響在無產階級中間的傳導者”。

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义者”，和德國的伯恩施坦分子以及第二國際的其他機會主義者一樣，公開修正馬克思的學說，在90—900年代，西歐也出現了一系列修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論的“作品”（桑巴特、伯恩施坦、庫諾夫等）。機會主義者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歪曲得尤其厉害。

在這批俄國和歐洲的馬克思主義的庸俗解釋者（他們為了使馬克思主義適合資產階級利益而竭盡歪曲之能事）中間，產生了“經濟唯物主義”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從90年代末期起到米·尼·波克羅夫斯基逝世時止，始終決定著他的歷史觀。

“經濟唯物主義”這個術語本身起源于資產階級。馬克思

① 列寧：《怎么办？》，見《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7—328頁。